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重要根据地，长期处于日军的严密封锁与频繁“扫荡”之中。在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军需物资的匮乏直接威胁着部队的生存与战斗力，而被服作为保障士兵基本生活的战略物资，其生产与供给问题尤为紧迫。面对敌占区经济封锁、资源掠夺与运输阻隔的多重困境，边区军民如何突破桎梏，构建起一套可持续的被服保障体系，不仅关系到抗日武装力量的存续，更是敌后根据地经济韧性军民协作能力的集中体现。

探究以往学术史，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被服生产研究成果较少，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后勤物资的筹措、民众勤务支前、动员群众制作军鞋等，而对被服生产的具体运行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分析。事实上，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揭示敌后根据地如何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实现“生产自救”，还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的抗战战略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支撑。本文以晋察冀边区被服生产为研究对象，依托历史档案与文献资料，系统梳理其从零散缝纫组到多层次工厂网络的构建历程，剖析原材料替代、技术革新与运输保障中的创造性实践。

一、被服工厂体系的建立

晋察冀边区被服生产体系的建立与扩展，是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在山西省五台县耿镇村组建，查国桢任部长兼政委。下设六个科，其中就包括军实科，负责武器、弹药、被服等的筹划和修理、保管、分配。“部队刚来到晋察冀边区时，正值风雪飘飘的隆冬季节，不少同志还穿着单衣和草鞋，供给部就想方设法开办工厂，张怀芳同志在山西代县动员了几家裁缝铺的十几名工人，带来了8台缝纫机，成立缝纫组。北平地下党派党员缝纫工赵廉光，带着7名工人和7台缝纫机来到根据地，就这样组织起晋察冀军区第一个被服厂”，建立起了初步的生产能力。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部队急需被装供给而又没有来源，主要依靠部队自力更生，组织军需生产来解决。当时，日军肆虐国民党军溃退，并掠夺和搜刮民间资财，更增加了组织军需生产的困难。但是，各级供给部门依靠边区各级政

简述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被服生产工作

■ 田冠华

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从1937年~1941年，据征集到的史料统计，先后创建了26个军需工厂。“1937年~1941年，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创建了一批军需工厂，组成了一支由民工转为军籍工人的军需生产队伍，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仅使晋察冀军区所属部队在创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得到被服供应，而且还供应了百团大战所需部分被装，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军需生产打下了基础。”

除了分区创立的军需工厂外，被服厂的生产体系还组织群众帮助工厂生产、建立被服合作社扩大产能。在军需工厂确实无法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下，“服装完不成，有时是工厂把做好的衣片发给当地妇女做，付加工费，有的是慰问军队尽义务。”被服合作社也是在供给困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自‘五一扫荡’后，冀中部队分散活动。被服供给机关不可能集体大规模活动，多用发动抗勤解决，但由于组织领导尚不健全，常常被服不能按时供给，”七分区为了克服这一缺点，把握公私两利的原则，贯彻精兵简政和为群众谋利益的精神，在受灾较重地区，以分散隐蔽的方式组织了被服合作社。这种灵活的生产方式，使得边区的被服生产能够更好地适应战争的需要，同时也为边区妇女提供了参与抗战的机会，增强了根据地军民的凝聚力。

二、原材料的筹措

原材料的筹措在日军“经济封锁”下是非常困难的。主要原材料如布匹、染料等，由供给部门采购站统一采购供应，其次靠工厂自力更生，当买不到必要的原材料和机器零件时，就自制或积极找代用品。如缺染料时，就采集槐树花，缺缝纫针就用破车胎里的钢丝磨制等。同时，十分注意节约。如裁剪衣服、鞋面布等，都要根据布幅宽窄左测右算，尽量提高利用率，裁下来的布条布尖用来垫鞋铺底。

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被服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通过内征、外购和就地收集的方式获得。“土布、棉花按政府核批数，由政府从征购中拨给，供给实物。有时，也由政府贸易部门

或军队的采购单位或被服厂自购一部分。冀中不出产的原材料辅料，如细布、颜料、缝纫机零件、机线等，就由采购部门派人或委托商人到敌占区秘密购运，有时，也委托政府贸易局代购。”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被服生产不仅涉及工厂体系的建立与扩展，还包括了对生产任务的精确分配与有效调度。这一过程对于确保前线部队能够及时获得必要的被服供应至关重要。“1941年以后，日寇对根据地加紧封锁，从敌占区不易买到的附料、物料，如扣子、刁色、硫化青、硫化碱等，就收集制线或旋木片做扣心，或收集旧铁皮、废铜交由地方手工业者加工扭扣、腰带、钎子等，因陋就简地以土代洋，利用槐花、橡碗子做土染料”，创造性地解决了现实问题，保障了原材料供给。

三、被服生产技术的创新

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被服生产要困难许多。一方面是战争环境带来的诸多不便，另一方面还有被服生产本身流程的复杂性所导致的不便，“被服生产从棉籽变成棉花，变成布，变成一套完整的衣服，要流过多少血汗，要经过多少麻烦的过程，单从布做成衣服、就要经过裁剪、打机、锁扣眼、装花、缝绱……这许多手续。”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被服厂不断探索技术上的创新，比如，采用最新式的剪裁法：一是“层叠裁剪法”，即洋布一次裁剪8层布，土布裁剪四五层，这样可以减少布边节约工人；二是“分件裁剪法”，即把衣裤上面的各种零件，分工裁剪，合拢去做，比较“全件裁剪法”节省很多。这种新式剪裁法的结果，对于布料是空前的节省。节省经费、材料对于抗战是有重大意义的，有效的节省能够很大程度上降低边区财政经济上的困难，“我们在敌人后方坚持抗战，所有财政经济的支出完全要靠边区，再不能靠别处。而抗战是长期的，那么我们在财政经济上就要作长期打算，才能够支持长期抗战。”在这样情形下，边区政府除了加紧生产以外，提倡节省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可以增强我们的抗战经济力量，给敌人更有

力的打击。

1940年，因敌伪对我军封锁严密，外来染料不易进口，被服厂积极探索染布方式。黄柏根、黄芹、槐子都曾为大批使用的染料，但黄柏根、黄芹产地区不广，运输笨重困难。至1941年乃全部改用槐子，槐子之优点是便于运输，色素浓烈，产区普遍。直到1943年春使用土产尚只限于黄色，绿色仍用外来品。在皮革装具方面则已用橡胶、树皮作鞣料，以代替外来橡胶。“1943年经再次试用土产结果，已能用橡胶染布为灰色，后又用橡胶打成灰底，再用槐子装黄，即成草绿色。若以橡胶壳上黑矾则染为黑色，可作冬衣用。橡胶壳产于冀西一带，产量大，用量小，故几乎全部采用了。”这种新的染布技术的发现为根据地节省了大笔费用，也就从侧面增强了边区抗战的力量。

四、被服的运送和坚壁

边区被服厂的大批布匹、棉花、染料都是从冀中根据地送来，生产出来的服装也需要送往各部队。在战争环境，部队驻地不固定，尤其在反“扫荡”中部队流动性更大，一天换几个地方很难找到，加上根据地内高山峻岭、道路崎岖、交通不便，不仅没有大型运输工具，群众唯一的运输力——毛驴也很少。因此，大量的物资运输要靠人背。从各采购站到军区后方基地，近者百八十里，远者几百里。为了把采购来的物资运回后方，地方政府在沿途设置若干转运站，转运站之间的路程，一般都是半日的行程，以便群众能在当日返回原地。为了及时妥善存放物资，各转运站设有临时仓库，这是运输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工厂生产的成品，要按时运送到分区各部队，为此，又建立了另一条运输线。同样是在沿途设置若干转运站，这样就在根据地内形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庞大的运输网，既保证了原材料不断地由前沿运往后方，又保证了后方产品及及时送给各部队，基本上做到了原材料和成品随到随运。如遇不能即刻运输时，群众都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做临时仓库，以防潮湿或丢失。当遇到日寇“扫荡”时，群众就将物资分散

坚壁到安全的地方。在运送过程中，边区人民历尽了千辛万苦、流尽了汗水，有的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日寇为把我军和边区人民困死、饿死，不断对我根据地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破坏。敌人很清楚，我军如果没有后方保障，抗战就难以坚持下去。因此，他们对我军根据地，特别是后方基地实行了极其残酷的“三光”政策。而我们为了保护军需物资和装备，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有效政策，使受到破坏和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敌人“扫荡”前，“我们把大部分被服装具分发给部队；必须储存的被装和原材料，以大量分散小集中的方式分别坚壁到较为安全的山洞里，或藏在老乡的家中；工厂的机器、工具则依靠工人和群众，深埋在地下或转移到隐蔽的山洞里。”在边区人民的帮助下，我军才得以在反“扫荡”中坚持被服生产。

五、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被服生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在极端困境中自力更生、团结抗战的典范。面对日军的严密封锁与频繁“扫荡”，边区通过构建多层次军需工厂体系、发动群众参与生产、创新原材料替代技术以及灵活调配运输资源，成功破解了被服供给的难题。从最初的缝纫组到覆盖被服、鞋帽、染织等领域的生产网络，这一体系的建立不仅满足了部队的基本需求，更以“层叠裁剪法”“土染料研发”等技术革新显著提升了效率，最大限度节约了资源。同时，广泛动员妇女与群众参与军鞋缝制、物资运输等任务，既缓解了生产压力，也强化了军民一体的凝聚力。在敌人的疯狂破坏下，“坚壁清野”策略有效保护了生产设施与物资，展现了战时后勤保障的灵活性与韧性。

晋察冀边区的被服生产不仅为前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更以“依靠群众、就地取材、灵活应变”为核心，形成了独特的战时被服生产模式。这一历史经验深刻证明，在资源匮乏与强敌压迫下，通过军民协作、技术创新与战略智慧，能够突破封锁、实现可持续保障。其自力更生、团结奋斗、因地制宜的精神内核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及价值意蕴探析

■ 耿巧歌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通过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来凝聚力量。对此，深入理解伟大建党精神需要从其内涵要义、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三个方面来进行阐释，以此助推新时代红色血脉传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

一、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要义

伟大建党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具有丰富的内涵要义。“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的思想指引和前进方向。“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为了实现伟大目标，以坚强的革命意志面对困难和挑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要坚持以民为本，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人民情怀。

二、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逻辑

（一）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为挽救民族危亡，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伟大精神。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不懈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翻译、撰文等形式，在中国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进程。中国先进分子在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积极领导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实践，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普及和传播，并且同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孕育了伟大建党精神。

（二）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指导思想，为伟

大建党精神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文化底蕴和内涵。两者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来源。

1. 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确保了伟大建党精神在理论上有坚实的基礎。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调实践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实际应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坚持为人民谋福利的初心使命，与“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相契合。“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奋斗中不断积累经验，开拓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观点赋予了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了人民利益至上的重要性。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并且为伟大建党精神“不负人民”的深层内涵奠定了理论基石。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文化依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文化来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视民众、追求大同等理念，以及自强不息、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内涵丰富，体现了古代先贤对人民利益的重视和关注，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文化支撑。例如，“民贵君轻”“君舟民水”

等观念，在新时代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重要借鉴价值。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包含了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的斗争精神，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精神支撑。

三、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意蕴

（一）思想引领：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价值

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伟大建党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发展，构成了国家和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伟大建党精神中包含理想信念追求、爱国爱民情怀、英勇斗争精神等，激励人民群众培养忧患意识。伟大建党精神具有思想引领价值，展现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品质，对于新时代我们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在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能够激励我们坚定信念和信心，凝聚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

（二）人才培养：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教育价值

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能够培养时代新人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青年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紧密相连。广大青年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使命。伟大建党精神包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屈的斗争精神等品质，是激励时代新人肩负历史责任的强大动力。伟大建党精神能够促进人才培养，引导时代新人坚定理想信念，激励青年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强化爱国情怀，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激励时代新人在面对困难时保持昂扬的斗志，强化责任担当，以此铸牢青年的信仰之基。

（作者单位：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质生产力赋能 城市生态绿岛建设迈向“智绿新篇”

■ 李 燕 李 玉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深刻阐释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内在联系。城市生态绿岛作为推动城市绿色发展的核心载体，是“为了改善城市热岛效应，通过绿地建设而形成的区域性的生态环境”，具有废弃物处理、美化环境、调节气温、休憩健身等多重功能。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正为城市生态绿岛建设注入强劲动能，要深刻把握其赋能的内生逻辑与实践路径，书写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智绿新篇”。

一、新质生产力赋能城市生态绿岛建设的内生逻辑

（一）坚持新发展理念，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与新发展理念的内在统一。同时也与城市生态绿岛的建设原则高度契合，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引。具体而言，表现为在创新发展理念方面，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契合城市生态绿岛转变传统发展模式，实现高质量、高效发展的需求；在绿色发展理念层面，新质生产力“要求摒弃损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改变过度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增长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与生态绿岛构建集约高效生产空间、舒适宜人生活空间、绿水青山生态空间的空间格局目标一致；在协调发展理念层面，新质生产力主张统筹区域资源禀赋差异，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与要素配置效率，形成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耦合的协同发展格局，这与生态绿岛基于生态优先原则构建全域统筹协调机制，通过空间规划衔接、产业协同布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手段，整合周边生态资源、产业资源、文化资源及人力资源的建设路径相同。因此，新质生产力赋能城市生态绿岛建设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新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革新传统生产力模式，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工业文明时代，大工业“建立了现代的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传统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下，呈现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主客二分”的价值取向，即资本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把大自然看成财富的主要来源而肆意掠夺，通过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资源掠夺性开发和劳动力剥削，破坏城市生态环境，导致人口暴增、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各种“城市病”的出现。可见，传统生产力模式的生态困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积累的无限性与自然物质代谢规律的对抗性矛盾：“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异化关系在当代集中表现为资本增殖逻辑对生态承载力的透支，新质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正是对这种异化关系的辩证否定，它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使劳动过程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破坏者”转变为“生态物质循环的调节者”。这种转变并非简单否定传统生产力，而是既继承了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又通过技术范式革新突破了资本逻辑的限制，引领生产力发展迈向全新的高阶形态，为人类城市建设开辟出一条经济繁荣、生态文明成果、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用理论来简化或替代现实复杂性的倾向。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城市生态绿岛建设的实践路径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对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探究

■ 姜 盈

1923年，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融合无产阶级革命与总体性辩证法，应对“第二国际”引发的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危机。进入新时代，立足于创新和创造性发展的时代课题，我们应全面把握，再度对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展开全面的探究，以寻求实践和理论的新启示。

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总体性辩证法

随着资本主义在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趋于缓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却屡遭失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在无产阶级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也出现了深刻的分歧。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作出庸俗化和机械化的诠释，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大相径庭。

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面对当前所面临的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事实，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发展的状况已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因此需要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考量。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并没有主张放弃辩证法，而是提出从“科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他对伯恩斯坦所主张的“运动即是一切”持批判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对当前的经济事实进行科学性的解读，试图从经济领域阐述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片面地理解成“经济决定论”，忽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

卢卡奇严肃批评了上述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错误倾向，他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他给出的答案是“总体性”辩证法。

二、对卢卡奇总体性辩证法的内涵解读

卢卡奇犀利地发现，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境域中的理论表述，正是对物化的理论性阐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商品经济的高度普遍化发展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了一种物与物的关系，这就是物化现象。为揭去这层物化现象的面纱，卢卡奇提出总体性辩证法的介入。

（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卢卡奇主张，若要正确理解辩证法，就必须将总体性范畴视为认知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他认为总体性辩证法的实质在于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卢卡奇断言，无产阶级要想维护自身的权利，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就必须达成对整个社会的总体性的认识，就必须既作为认识的主体也作为认识的客体，才能担负起揭掉这层物化现象面纱的革命性任务。

（二）整体与部分的统一

整体是部分构成的，而部分则是整体中的部分，并具有相对独立性；整体对部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整体对于部分来说处于支配地位。一方面，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事实剥离出来考察，忽视其社会发展历程中与其他社会素材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卢卡奇所批判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从个人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发展，不仅无法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反而陷入自我矛盾和认识误区。卢卡奇强调，总体性辩证法是要把社会发展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充分揭示社会发展规律。

（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所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证明了总体性的观点中的理

论与实践的统一。正如卢卡奇所说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一种革命的辩证法”，主体就是总体。只有将人的实践放在首要的位置，恢复人的整体性，才能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

三、总体性辩证法的局限性

除却对卢卡奇的褒奖，其总体性思想也曾饱受争议。其对总体性思想的阐述中涵盖着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错误解读，从而使其总体性辩证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他过分夸大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忽视了自然对人的影响。卢卡奇批判了恩格斯对于第二自然的自然辩证法，称恩格斯是将“辩证法的主体边缘化”，他将辩证法囿于社会领域而对自然领域丝毫不提。而马克思更加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卢卡奇站在革命立场上阐述辩证法，并未将辩证法彻底回归于人身身的全面发展，仅停留在社会历史层面。

其次，虽然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实践的观点，但卢卡奇却过分提升了总体性辩证法的功能性和地位，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卢卡奇未能充分重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理论体系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卢卡奇对经济的狭隘表述则证明了他无法像马克思那样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中去得出正确而又一语中的的认识和见解。这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认识也使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展现出唯心主义的苗头。有明确的迹象显示，他更倾向于采纳“总体性”这一范畴，以此来构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哲学框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用理论来简化或替代现实复杂性的倾向。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